

季

辛

吉

辭

職

的

風

波

孫德湘

美國國務卿季辛吉（Henry Kissinger），突於本（一九七四）年六月十一日，在奧國沙爾斯堡（Salzburg）的一次記者會中宣佈，除非指控他在政府「非法」電話竊聽案情中獲得澄清，否則他將辭職。這一驚人的發展，發生於美國總統戰後首次歷史性訪問中東的前夕，不僅將轉移此次訪問的重要性，並把世人的注意又拉回到「水門事件」有關的問題上面去，無論對美國或整個世界，均屬不幸。

季辛吉參加尼克森總統的訪問行列，於六月十一日晚飛抵奧國的沙爾斯堡，轉道前往中東。在此一特殊的記者會中，他對美國國內報刊指控他「在尼克森政府的第一任期，創議或發起要對那些洩露國家安全機密的可疑官員與記者，實施電話竊聽」〔Wiretaps on persons suspected of national security leaks〕，感情顯得非常激動，他以微帶戰抖的聲音提出警告稱：「我不相信，當一位國務卿的人格與信用（character and credibility）有問題時，他如何能有效地指導或指揮美國的外交政策。倘使在這方面不獲澄清，我將辭職」。同時，季氏另又指出：「唯有我的名譽不成問題，而且，唯有人們對我具有信心，我方可繼續担任國務卿的職務；倘使這樣做不到，我將立即交出我的職務，讓那些較不受大眾攻擊的人來担任」。消息傳出之後，不但在美國國內引起軒然大波，並使舉世為之震驚。

前因後果

在華府的人們都知道，季辛吉國務卿在其六月十日動身出發之前，對文件的透露並對未經證明來源的解釋「認為他在電話竊聽案件中所扮演的角色，遠較他自己所承認者更為重要」，一直耿耿於懷。人們也都知道，在完成其中東三十四日的辛勤談判之後，季氏已顯得身心交疲。

季辛吉從中東回來之後，曾於六月六日（週四）舉行過一次記者會，當時他原期將被問及有關中東外交問題，卻沒有料到，所有問題都集中在電話竊聽上面，這使季氏大感不耐與憤怒。不過，人們更沒有料到，國務卿竟會

在隨同總統啓程訪問中東的中途把事情爆發開來（the outburst of emotion）。

在七十分鐘的單獨說話與回答問題的記者會中，季氏一次都沒有笑過；在會議進行時，他的憤怒似已上升，聲音沙啞，面容嚴肅。他一開頭就這樣說：「上週四，你們中有很多人認為我似乎有些激動、憤怒、緊張、反常，所有這些用詞都是對的。在中東逗留五週之久，我對在美國所進行的各種調查，都沒有去想過」。

季氏在此次記者會中透露，他曾於六月九日（週日）致函參院外交委員會主席傅爾布萊特（J. William Fulbright），要求該會對電話竊聽的指控，作一次新的檢討；接着，就宣佈該函內容要點：

（一）有些說法（innuendos）暗示，與我的證詞矛盾的證據已經出現。這些都是沒有根據的說法。

（二）據我所知，所有可用的證據都包含在同意我出任國務卿的公開或秘密證詞之內。

關於季氏本人在安全調查中的任務，他說這是「兩害相權取其輕」（a case of choosing the lesser of two evils）。季氏說：「我覺得電話竊聽不是滋味（I find wiretapping distasteful），洩露機密也不是滋味（I find leaks distasteful），因此，必須有所選擇。回想起來，這似乎就是我的立場與任務」。

季氏說明，一九六九年初，他為一連串過份違背國家安全的行為所困擾，因此，他向尼克森總統表明其關切。經由當時的司法部長米契爾（John Mitchell）與聯邦調查局長胡佛（J. Edgar Hoover）的建議，總統下令設立「國家安全電話竊聽制度」（the institution of a system of national security wiretaps）。於是，他的辦公室就提供了竊聽人員的名單。所以，事實上，電話竊聽是合法的，它是遵照設定的程序而設立的。季氏同時指出：

（一）他的辦公室未曾收到任何竊聽不法婚姻或色情事件的報告。他並指

出，曾收到被稱為「強暴」(outrageous)的報告，但未指明其來源。

(一)由於聯邦調查局的胡佛局長在備忘錄中曾提到季氏的談話「繼續偵查下去，倘有所發現，我們將毀了他」，此係指國家安全的違背者而言；他是否說過此話，已不能記憶。季氏指控，即使他曾說過此話，他的說話也被記者所曲解。

(二)他不是一九七一年創設「水管工人或闖入者集團」(the plumbers group)的主使者，以阻止國家安全機密的洩露。他從未聽到此一行動，如外間報導所指，他曾在南加利福尼亞州的直升機上被告知此事，則可能由於引擎的聲音，他沒有聽清楚。

國會反應

自從季辛吉國務卿威脅着要辭職(threat to resign)這一消息宣佈之後，國內外的反應極為熱烈，幾乎所有全世界的各大報刊均以頭條新聞報導此事，並先後紛紛發表評論。但，這畢竟是美國的內政，美國的反應，尤其是國會的反應極關重要。

尼克森總統：總統的反應是意料中事，當日就透過其新聞秘書齊格勒(Ronald Ziegler)發表聲明稱，他可以斷定，在美國及全世界，那些追求和平的人都深知，季辛吉國務卿對國際信任與國際了解方面所作的貢獻(contribution to international trust and understanding)，他們諒能與他保持同樣的看法，國務卿的名譽不須辯護(the Secretary's honor needs no defense)。

美國國會：美國參眾兩院對季卿的談判智慧與才能而產生以阿與以絞的軍事隔離協定(disengagement accords)，具有廣大的支持，多數議員表示，季氏的去職對世界和平是一種災難。

參院外交委員會主席傅爾布萊特(J. William Fulbright)宣稱：該會已循季氏所請，一致決定將對電話竊聽一事，重作檢討。傅氏個人不認為，季卿應該辭職，如此將產生不良影響；他不願見，季氏為這樣一件事而辭職。

參院多數黨領袖並兼任外交委員會委員的曼斯菲爾德(Mike Mansfield)稱，季卿在事發以前曾告以辭職之意，他當時立即告訴季氏，他甚至不應該考慮此事，他認為季氏是一個極為優異的國務卿(an absolutely superb

secretary of state)。

曾企圖問鼎白宮的民主黨參議員麥斯基(Edmund Muskie)，他是參院外交委員會「調查國家安全與電話竊聽」小組的主持人。麥氏表示對季卿的全心全意支持，他不信季卿此時應該辭職。他認為，此案應儘可能迅速予以澄清；不過，他抱怨說，當時司法部拒絕該委員會所請，以調閱電話竊聽及其他一切有關文件，不然該案應早就獲得澄清了。同時，麥氏並宣佈了司法部長薩克斯比(William Saxbe)五月二日的一封信，該函拒絕提供資料，因為美國地方法院已下令予以封存。

加州民主黨參議員克蘭斯頓(Alan Cranston)沉痛指出，水門事件現在威脅着要拖垮季辛吉了，一位尼克森政府中對和平具有這樣多貢獻的人，真是可悲。

現年八十一高齡的共和黨參議員艾肯(George Aiken)，他也是參院外交委員會的委員。這位年高德劭的國會議員指出，季卿威脅着要辭職簡直是愚蠢，他為什麼不能容忍？要知，受批評或受攻擊乃是從政生涯的一部份。

民主黨賓州眾議員艾爾伯(Joshua Eilberg)，他是眾院司法委員會處理彈劾尼克森總統的一員。他於六月十一日告訴記者說，雖則季氏否認他主動提出電話竊聽建議，只是提供觸及機密(access to information)人員的名單而已；但，眾院司法委員會彈劾小組所獲資料不僅是對季氏電話竊聽部份的指控而已，而且具有積極的證據(positive proof)。據說，眾院彈劾小組聽到一個錄音膠捲，此係一九七三年二月二十八日尼克森總統與狄恩(John Dean，總統法律顧問，後來出而作證對尼氏極為不利，水門事件的擴大與彈劾的醞釀，均由他而起)的談話紀錄，尼氏在此一紀錄中曾提到，季氏要求電話竊聽，但季氏最近(六月七日)在參院作證，再度否認此事。

此外，記者問以「季氏及其前任助理、現任白宮幕僚長的海格將軍(Alexander Haig)在電話竊聽案中所扮演的角色」，艾爾伯眾議員答稱，季氏與海格創議要對國家安全部門的官員與記者裝置電話竊聽，而且尚有另外十七件電話竊聽的案子，季氏的確預其其事；我不能告訴你一切詳情，但這是我們所發現的事實。艾氏又補充說：「眾院司法委員會具有白宮的備忘錄，包括我所說的一切」。又有記者問他，季氏作證時否認尋求電話竊聽，是否在參院說謊或作偽證？艾氏答稱：「我沒有詳細檢查他的證詞，但我

知道其間有衝突之處，苟如此，則他是在說謊或作偽證，這是他的錯誤：由於他在外交上有突出的表現，可能有壓力要我們除去他的缺失，但我認為，事實就是事實」。

衆院司法委員會的另一民主黨眾議員華爾地（Jerome Waldie），他是主張彈劾總統的人。他告訴記者稱，他相信季卿可能站不住腳；他的印象，季氏爲若干問題所困擾，一如整個政府所感受的一樣。

就事論事

若干熟悉美國內情的政治觀察家認爲，季辛吉威脅着要辭職，是他進入政府以來所作最可笑的一件事情，他實在不必把事情弄得這樣嚴重。

問題顯然是：究竟他是否直接創議，要用電話竊聽來對付他白宮的同僚，這他已否認；或則，別人主張如此，他並不反對而已？這是一九六九年第一任尼克森政府開始時的事情，這裏面有很大的差別。他是否首創電話竊聽或曾以容忍或默認，都不是什麼大不了的事情。無疑，事情的真相他是知道的，對此，他並不否認。

我們可以這樣說，他在那時就應辭職，而不應默許對他的同僚施以電話竊聽；或則，他在參院外交委員會作證時，把這一問題解釋得更清楚些。但現在，在奧國的一次感情用事的記者會中，正值總統開始訪問中東之際，並在與蘇俄作重要武器管制及貿易談判，以及與歐洲爲大西洋聯盟的前途作談判之前，威脅着要辭職，實在奇怪。

從中東從事「穿梭外交」（shuttle diplomacy）回來後的若干時日，季氏都被電話竊聽問題所困擾。他曾在私人談話中表示，倘使總統面臨彈劾，而國務卿則又被控偽證，美國如何來指揮或操縱其外交政策？所以，他考慮不伴隨總統作中東之行；他把此事就商於政府、國會議員及新聞界，他們都告訴他，這樣豈不是把一個舊的爭議變成一個不必要的危機嗎（to turn an old controversy into an unnecessary crisis）？因此，他決定作中東之行，顯然，他在旅途有所打算，正如他在華府時所說，這是個人名譽問題，必須予以澄清解決。所以，他在沙爾斯堡的記者會，什麼都沒有說，只是戲劇化其辭職威脅而已。

這樣做法顯然不是構成辭職的問題，也不是辭職的時候，更不是辭職的

地方（this was obviously the wrong issue, at the wrong time and in the wrong place），但却說明了他內心的矛盾與困惑（the paradox in kissing）。

再回到電話竊聽問題上面來，季氏自己的處境可能也很困難，他可能與其他白宮人員一樣，遭受重大的壓力。當消息洩漏出去，而當時總統手下的兩位紅人艾立克曼（John Ehrichman）與哈爾德曼（H. R. Haldeman）要求制止時，季氏知道他自己也有嫌疑；他甚至也不能斷定，他自己的電話是否被竊聽？大概在這樣懷疑的氣氛中，有人主張電話竊聽，無論對也好，錯也好，季氏同意了此一作法，因爲，倘使他不同意，將被指有洩密之嫌。

季氏的辭職威脅顯示，即使最聰明的人也會做出怪異的事情，而他的奧國記者會則是怪異之最（stranger than most）。在大衆心目中，季氏沒有多大問題，他是一個腳踏實地的人，善於處理極端複雜的問題；但，現在，他在電話竊聽上造成令人難以置信的大問題，國會必須使之水落石出。

此外，季氏此次似已把他自己與尼克森總統連在一起，作爲不負責任新聞報導的犧牲者（as a victim of an irresponsible press）。這本是他經常要想設法避免的，此點值得人們尋味。

不能高出法律之上

當外國的當政者想到，尼克森總統可能被彈劾時，他們會想到，季辛吉國務卿仍將存在，足以保證美國外交政策的繼續與不變。至少，一直到現在，他們都是這樣想的。但，自從季氏辭職的風波發生後，他們可能開始懷疑，並感覺困擾。

季辛吉是美國所有國務卿中最具突出表現者之一，在國際政治上具有獨一無二的地位。他在很短時間之內，同時形成了美國與蘇俄及中共的修好，解開了美國捲入越南的「死結」，恢復了美國與埃及的外交關係，並促成了中東的隔離，可能導致持久的和平。即使他只是偶然掌握歷史的潮流（to harness the tide of history）而已，但却做得這樣成功，也是政治家罕見的能力與奇蹟。不錯，他的若干成就較其後來的證明爲好，例如：越南仍有戰爭，與蘇俄交好的進步也有限，中東的局勢還是令人難以安心，與歐洲的關係在外表上仍未弄好；但，他的成就仍是極爲重要的。他的智慧與才能

，加以若干特異的作法（some deviousness），已使美國的政策產生新的一貫性，大大促進了美國與自由世界的利益。所以，他的辭職較尼克森總統的辭職，更使舉世震驚。

但，所有這些都不能使他高出法律之上，也不能使他不對其行動負責或不受批評。在事實沒有確立以前，他的反應如此激烈，並以辭職為威脅，可能對其本身案件有損。他不能期望，可以免受考問或質疑，這是政府任何人員所必須遵從的；這是由於他的職位重要，並對他的期望殷切而使然，即使他極不願意如此作，也無可奈何。

這中間，有若干問題必須弄清楚：

（一）一九六九年對政府官員與記者實施電話竊聽，他究竟牽涉在內到何種程度？

（二）電話竊聽合法嗎，是否遵循正當的程序？

（三）當被提名為國務卿而在參院外交委員會的聽證中，在宣誓向該會作證時，他所說的都是實話嗎？

（四）倘使不實，此是否不能使他繼續擔任國務卿？

這些問題目前正在參院外交委員會檢討之中。在結果與真相大白之前，有些事情還是值得一提。季氏具有明顯的理由去阻止白宮的機密外洩，對可疑人員實施電話竊聽不一定是非法的行為。但，倘使他問心無愧，就不須在參院外交委員會的祕密聽證中有所保留而不說出真話；在這種情形之下，參院有權獲知真相，他在誓言之下也有提供真相的義務。倘使證明他所說不實，此可能造成嚴重的問題。外交的出奇制勝是一回事，因為這是外國政府所希望的；在國會說謊或作偽證，則是另一回事。但，即使證明作偽證，也不一定非要他辭職不可。倘使他不顧自尊而把決定留給參院，任何人也不見得會把事情逼到如此地步。因為，他的成就就是人所共知的，沒有人會低估他的離去對美國外交政策的影響。事情可能變成這樣，季氏「半真半實」的成份多於「不真不實」（more guilty of half-truths than untruths），如此，就有充份妥協或緩衝餘地。

但，在參院外交委員會設法確立事實與真相之際，美國的新聞界似應有所約束而保持相當的分寸（to keep a sense of proportion）。季辛吉國務卿致力於增進美國的利益，他有理由可以希望人們對此有所認知。他從中

東回來後的第一次記者會，竟變成了電話竊聽的辯論會，新聞界的表現未免過份。因為，事實非常明顯，中東的和平遠較電話竊聽記者重要。倘使這是對季氏的努力與工作的忽視，則此後可能會遭遇更大與更多的阻撓。

直至目前，偵查水門事件的整肅精神（the purging spirit）可能是有益的。因為，它已樹立了一種制度，政府任何官員不能居於法律之上，追求合法的目的不能使不法的手段合法化。但，如果真理與真相的追求帶有煞氣，此將產生相反的結果。目前的危險已十分明顯，季氏所被指控的行為與偵查水門事件所揭發出來的一連串不法行為，不能相比；倘使一次正當的偵查變成了對人而不對事（a manhunt），則將是一種錯誤，對美國及其盟國均將產生大害。

結語

季辛吉在全世界各地擁有數以百萬計的崇拜者，但他在華府的朋友却為數不多。這是他那些少數的忠實朋友為沙爾斯堡的驚人消息所嚇到的原因之一。很明顯，這是由於在中東奔走操勞之後而身心交疲所致；但，就其對政治的全部了解而言，他對華府的政治現實可能顯露其危險的誤解。

季辛吉強調：「一位國務卿，在其名譽與信用遭受考問之時，不能指導外交政策」，這一說法不一定真實。例如杜魯門時代的國務卿艾奇遜（Dean Acheson），當其策劃較中東和平更重要的政治目標——北大西洋聯盟（NATO）時，經常受到國內的攻擊，而其國外的信譽並未受損。實則，艾奇遜的國外信譽，由於他對遭受攻擊的冷靜表現，反而增高了。季辛吉並不缺少此一氣質，但他似對美國的民主程序感覺不耐（impatient with American democratic process），此使他的朋友特別感到困擾。有人甚至這樣說，這可能是季氏的致命傷（a fatal weakness）：由於他所能獲知的美國政治制度的知識，他似乎不太能了解，他應對人人負責，不單是總統。事實上，季氏知道他對國會的責任，而且與參院外交委員會建立了密切互助的關係。據該外交委員會主席的一位密友稱，這一關係乃是傳爾布萊特出而競選連任的原因之一。

因為，有太多的歲月，傳爾布萊特不得不與魯斯克（Dean Rusk）相週旋，他僅能為美國捲入越南作辯護；然後，又不得不與羅吉斯（William

Rogers) 相週旋，他僅能一再申述，美軍已在撤離越南。於是，在其任職的晚期，來了一個在觀念方面可以相與 (to conceptualize along) 的季辛吉。這一喜非同小可，因此決定再度出馬競選。傅氏的競選雖已失敗，但仍將留任外交委員會主席至本年年底，即使季氏在其作證時可能犯了「真假參半」(half-truths) 的過錯，傅氏仍將證明是一個友善而有力的朋友。

但，季氏這樣的朋友不會很多。「水門事件」的對頭人 (the watergate men) 可能不會放過他。況，季氏尚有更壞的敵人，他們側身於關心國家安全的學術界 (the academic community)。其他「哈佛」出身的國務卿可以寄望這些學術界人士的支持，但不是季氏。

有些理由是久為人們所熟知的。季辛吉昔日常誇口，他經常是孤軍奮鬥的 (always to act alone)，但，這並不常是由於選擇而出此，而是由於沒有朋友而出此。季辛吉從未被哈佛所完全接受 (never to be fully accepted at Harvard)，這並非由於他不是在美國土生土長的關係。從時髦的美國意義來說 (in the fashionable American sense)，季辛吉不是一個自由主義者 (liberal)，根據多年來的事實表現，他似乎有些接近於死硬派 (hardliner)。

這些學院派或學術界人士 (these academics)，他們現在大多不在政府，也不在可以建議或影響政府的圈子裏。季辛吉則不然，他身居政府要津，權重一時，自為他們所不齒。季氏很成功地展開了「和解政策」 (policies of detente)，在學術界人士看來，這是他們早期幫同策劃的東西，現在仍認為是他們的東西，只不過是假季氏之手予以實施而已。

也許，有人可以辯稱，學術界的支持沒有多大重要性，季氏憑自己的努力與成功，已為他贏得了更大的地盤：全美國的擁護。事情也未必如此樂觀或肯定。除了羣衆歡呼的可變性 (the fickleness of popular acclaim) 外，自從越戰之後，一般美國人對外交事務的追求仍是喜怒無常。季氏東西和解政策的最後目標可能證明，不如他的越南撤軍與中東和平那樣得人心與受歡迎。

尼克森總統及季辛吉國務卿與蘇俄談判的立場強調，國與國的關係，其指導與設定不宜純粹以理想為基礎 (to be conducted on a purely idealistic basis)，也不應干涉別國的內政。但，下屆白宮主人呼聲頗高的民主黨

參議員傑克遜 (Henry Jackson) 則公開站出來向此一政策與立場挑戰，以很大的多數在國會通過了「傑克遜修正案」 (the Jackson Amendment)，使給予蘇俄最惠國待遇 (the granting of most favored treatment) 將視 (蘇俄猶太人的) 自由移民而定。許多西歐人士支持傑克遜的主張，尤其英國。

我們不一定同意傑克遜所有的看法，但他已劃定爭辯的焦點，在這方面季氏可能失敗。其實，尚有比「蘇俄猶太人自由移民權利」更重要的東西牽涉其中，傑克遜參議員只是機智地選中其敏感的側翼予以攻擊而已。要之，尼克森與季辛吉的「和解或談判」政策不是沒有問題。

季辛吉的政策目標，主要是歐洲的實質和平與國防以及促進各國的國家利益；但，傳統的美國態度，與其說是「思想」的 (ideological) 還不如說是「理想」的 (idealistic)。在這方面，美國一直不變地要把「美國的標準」 (American standard) 加諸窮國與落後的外國人。威爾遜總統的十四點計劃與甘迺迪總統的就職演說是主要的例子，而傑克遜的修正案則是最近的例子。

季辛吉認為，傑克遜等人所持的態度是錯誤的，也是危險的。無疑，甘迺迪總統的就職演說，導致了越南戰爭的升高。威爾遜總統的十四點計劃，也部份遭遇失敗，因為，外交政策不能當作救世軍 (as a crusade) 來運用。

因此，季辛吉與傑克遜的對抗是基本的 (fundamental)。在理論上，季辛吉多半 (more than half) 是對的。但在實際上，傑克遜可能多半具有獲勝的機會，因為，傑克遜不僅代表那些被蘇俄對待索忍尼辛及巴諾夫等人所激怒的美國人 (其實，誰能不被激怒？)，而且也代表那些反對與共黨作任何妥協的美國人，這在早期看來，何異對抗共黨邪惡的美國救世軍。

處此情況之下，季辛吉需要朋友，不僅是白宮、國會及新聞界的朋友，也需要學術界的朋友，尤其後者，因為他們能影響政客與記者。

季辛吉沒有威脅的本錢，除非真正準備辭職，而放棄其使美國外交政策作偉大的歷史性改變的機會。他的少數朋友是有力量的，尤其是傅爾布萊特。但，季氏本人必須改變其作風，要學習「逆來順受」 (learn to take the rough with the smooth)，倘能如此，對他大有幫助。